

对于“依法带娃”这件事，磐安使出“三字法”

通讯员 陈新森

今年1月1日,我国首部针对家庭教育的专门立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正式实施,磐安县妇联、教育、公检法司等部门以及各乡镇,创新方式,多方发力,采取讲、送、用“三字法”,让“依法带娃”的理念入耳入脑、入心入行。县妇联主席施迎霞介绍,3个多月来,当地持续深入宣传贯彻这部法律,指引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成为合格家长,有效发挥职能部门和家庭、社会、学校各方作用,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“第一粒扣子”。

讲师团深入浅出“讲”法

磐安县九和中心小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,距离县城1个多小时的车程,全校六个年级仅有6个班,共40名学生,大多为留守儿童。针对学生不多且年龄小的特点,县检察院干警陈海飞专程赶到学校,用通俗易懂的语言、图文并茂的PPT,给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辅导课。

“有没有开展亲子阅读?”“做错事了,家长如何开展教育?”“父母离婚后,有没有来看过你?”互动之下,不少孩子吐露了心声,陈海飞结合法律条文认真讲解,一一解答了孩子心中的疑问,强调了“依法带娃”的要求,鼓励孩子们回家后向父母宣传学到的法律知识,建立更亲近的亲子关系。课后,陈海飞还向孩子们赠送了普法大礼包。

检察官厉惠娜则来到新城中学录播教室,为1000多名学生家长送去新学期“家长第一课”:如何依法带娃。她以解读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主线,围绕“家庭教育由谁担主责、家庭教育主要做什么以及家庭教育可以怎么做”三个问题,讲解了法律所明确的家庭责任、国家支持、社会协同和法律责任。

两位检察官都是县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,讲师团20多名成员来自县委宣传部、妇联、团县委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党校、公检法司等部门,以“本地人用本地话讲本地事”的方式,走进干部讲堂、文化礼堂、学校课堂等,宣讲达300多场次,把“科学育儿,依法带娃”的理念灌输到千家万户。

山妹子进村入户“送”法

“小芸,我们看你来了。”尖山镇妇联主席王咪咪走进乌石村一农户家里,“这是送给你的画笔、画纸,有空多练练。还有送你的口罩,疫情期间,出门别忘戴!”

小芸的父母长年在外务工,爷爷奶奶在老家带她。同去的村妇联主任张炎光将一本小册子递给小芸爷爷:“这本法律书,儿子回来叫他看看,叫他平时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,带好孩子是法定责任。”

尖山镇有36个行政村,200多名留守儿童,镇妇联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宣传宣讲,要求村妇联主任每月至少走访两次,向孩子们传授安全防范知识、开展心理疏导,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,把关心关爱送给留守儿童。

在磐安山区,人们称妇联干部为“山妹子管家”。全县有240多名“山妹子管家”成了广大妇女的“娘家人”和“好姐妹”。线上,县妇联在微信公众号上开通“普法小课堂”,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法律法规,及时推送家风家训、家教育儿、亲子阅读等知识,家长随时随地可以线上学习。线下,县妇联印发家庭教育促进法读本1万册,借助“山妹子管家”贴近群众、了解户情的优势,进村入户,送法到地头田间、工厂车间。同时,县妇联在全县232家“儿童之家”都开设了宣传专栏,让家长们不出村就能便捷学法,并通过专题阅读、展板学习、折页阅览、志愿者讲解等方式,帮助家长们树立科学教育观念。

县妇联在县城中心广场举办“依法带娃我能行”趣味闯关活动,通过抢答宣传家庭教育知识,通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提升亲子关系;大盘镇、双峰乡妇联举办家庭教育座谈会,针对隔代育儿、“双减”政策、青春期应对等家庭关注的问题,探讨交流、分析案例、寻找对策。

全方位联动亲子“用”法

“过去,我一直以为让孩子有好吃、有好穿、有钱花,供孩子上培训班,考得好多奖励,就算尽父母的责任了。”家住磐安县盘峰乡榉溪村的一名“80后”家长,在参加完乡里组织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专题讲座后,恍然大悟,“没想到,孩子带不好、教不好,我们不仅是没有尽到做家长的责任,还可能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”这名家长曾是个“麻友”,几乎天天泡在麻将桌上,有时输了还将火发在孩子身上。现在,这名家长已远离麻将桌,有时间就陪孩子做家庭作业、玩亲子游戏,父子关系融洽,家庭变得幸福和谐。



袁继青是磐安县教育局幼教科负责人,常年从事幼儿教育,接触过各类“问题少年”。在他看来,许多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就以为万事大吉,根本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;一些离异家庭,孩子从小缺少温暖,导致性格孤僻;一些父母生活不自律,对孩子教育简单粗暴;还有些家长忙于工作,没时间也不愿意陪伴孩子;有的家长又过度娇惯、放任孩子……“现在有法可依了,关键是要把法贯穿于家庭教育生活中。”袁继青说。

在凤凰书院学生家长座谈会上,初三年级学生陈奕赫的家长陈瑜说道,无论孩子考得好不好,家长都要投以暖心的拥抱和灿烂的微笑,要想孩子健康成长,必须让孩子感到家的温暖、和父母在一起的幸福。

“我想静静”,能行不?

新华社 吴文诩 孙晓

工业噪声、建筑施工噪声、交通运输噪声、社会生活噪声……当下社会,噪声似乎无处不在,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困扰。为此,一些诸如震楼器等“神器”走红网络。这与其说是反击噪声,不如说是互相伤害。

“我想静静”,究竟出路何在?

噪声污染,公共健康第二杀手

噪声除了扰民,也会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。世卫组织发布的《噪音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》指出,噪音危害已成为继空气污染之后的人类公共健康第二杀手。有实验证明,人长期在噪声中,会导致失眠、多梦,休息和睡眠质量变差,甚至引发或触发心脏病、神经性耳鸣、耳聋等疾病。

统计显示,2020年,全国生态环境信访举报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44.1万余件,其中噪声扰民问题占41.2%,位居各类环境污染要素第二位。在所有噪声污染中,社会生活噪声投诉举报最多。

社会生活噪声问题的处理往往也更为棘手。大到广场舞、商圈外放音响,小到室内跳绳、走路。社区工作人员

指出,此类噪声的“威力”或许并不大,却更容易激发社会矛盾。

与噪音问题多样相对应的是相关部门的“捉襟见肘”甚至“不作为”。许多网友反映,自己就噪声问题报警或求助政府机关后,存在被应付、踢皮球的情况。有网友吐槽:“找环保说归城管负责,找城管被告知应找警察,找警察说归环保管,都成了闭环了!”

取证难、胜诉少、治理难

噪声治理为何如此之难?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海嵩教授表示,由于噪声污染特性与常见的水污染、大气污染等化学污染存在显著不同,具有暂时性、分散性、局限性等特点,在监测、认定上存在困难。

北京泽达律师事务所田春秋律师表示,噪声污染可能涉及工业、交通、生产生活等多种源头,监管涉及环保、工商、城管等多部门,常常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,所以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难题。

对普通大众而言,虽然可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,追究噪声污染者的侵权责任,但此类诉讼因要求精神损害赔偿,需要由受到噪声污染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,在司法实践中胜诉较少。

受访专家还表示,伴随着城市化、工业化的不断推进,我国的噪声污染区域由城市扩展到农村,高铁、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噪声源不断出现,加之我国城市高密度居住的

特殊国情,更让噪声污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趋明显,治理难度变得更大。

加强社会共治,回归“安静”社会

今年6月5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将施行,1996年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同时废止。新法实施后,噪声污染能消停不?

陈海嵩说,为呼应社会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需求,新法调整了噪声污染防治法的防治对象和适用范围,扩大工业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的定义,地域适用范围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。

田春秋表示,从当事人角度出发,新法规定更加明确,能够让普通民众更有法可依。例如,新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开展娱乐、健身等活动,如果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,拒不改正的,给予警告,对个人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。这对于长期受到噪声污染的群众是个利好条款。

针对社会生活噪声,新法特别强化了社会共治内容。陈海嵩说,法律制定者希望通过公众参与、基层群众自治的方式促进噪声污染治理,这呼应了我国环境法“公众参与”的基本原则。未来还需要相关部门、社区组织参与,形成协调和管控噪声污染产生、反馈和沟通的常态化机制。